

# “七十子”与儒学在江南的传播\*<sup>1</sup>

高华平<sup>1</sup> 沈月<sup>2</sup>

(1.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

2.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七十子”是对孔子弟子中贤达者的代称。“七十子”中到过江南的，有子贡、子游、澹台灭明以及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子贡到江南游说吴王伐齐、吴晋争霸，成功免除了鲁国被齐国侵犯；澹台灭明“南游至江，设取予去就，从弟子三百人，名显乎诸侯”；子游则把其与孔子相同的“大同”理想带到了江南；臂子弓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是文献记载的将《易》学南传的第一人。“七十子”中游江南的孔子弟子的学术特点都在于“文学”，其思想特点是儒家而包含有道家思想的倾向，其传播路线则是由齐鲁而南下江南。这与江南吴越之地当时的地域文化特点是基本吻合的，反映了早期儒学传播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七十子”；儒学；江南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俗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二人’。（《索隐》：“《孔子家语》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庙图》作七十二人。”）”<sup>[1]</sup>可知，“七十子”是孔子身后世人对其弟子中知名者的代称，而非实数。依《史记》和《孔子家语》等书记载，史籍中明确提到孔子弟子中籍贯属于或到过江南吴、越之地的，似乎只有子贡、子游、澹台灭明等少数几位。另外，则有传《易》的孔子之再传弟子臂子弓。但如果从以孔子为标志的儒家学术思想在江南的传播来看，则此数子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 一

传世文献中对孔子弟子游江南有详细记载的，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而对子贡游历吴越的记载，又堪称其中之最。根据《史记》的记载，子贡是孔子弟子，姓端木（沐），赐是子贡的名：“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sup>[2]</sup>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齐国“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sup>[3]</sup>属于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孔子弟子子路、子张、子石皆“请行”，欲以赴国难，但“孔子弗许”。只有当“子贡请行”时，孔子方才“许之”，<sup>[4]</sup>可见孔子对子贡的信任。故《论语·先进》一篇，以宰我和子贡作为“言语”一科的代表。<sup>[5]</sup>于是子贡至齐，以其辩才说服田常与吴争霸，并答应舍鲁伐吴。“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子贡说吴王曰：

“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仁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

<sup>1</sup> 收稿日期：2017-1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先秦诸子综合研究”（15ZDB007）

---

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sup>[6]</sup>

子贡又行成于越，回报吴王说，越王诚惶诚恐，忠心待吴，对吴王之恩“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吴王大说，这才放心，“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sup>[7]</sup>不仅使鲁国免除了侵犯，还有了此后的齐、吴争霸的“艾陵之战”和吴、晋二国之君的“黄池之会”，还有了此后的越王勾践灭吴和吴王阖闾自杀。

## 二

传世文献中对孔子弟子游历江南有明确记载的，另一位是澹台灭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南游至江南，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sup>[8]</sup>

澹台灭明，是武城人（今属山东费县），即鲁人。根据《论语·雍也篇》的记载，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他在武城发现什么人才没有，子游说有位澹台灭明，“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sup>[9]</sup>向孔子推荐了澹台其人。澹台这才进入孔门，成为孔子的及门弟子。澹台本与江南没有关系，但他为什么最后会去了江南呢？根据《仲尼弟子列传》的说法，似乎是因为他相貌太丑陋（文献中除了《孔子家语》中有一处说“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之外，其余皆记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即以子羽为形陋也”<sup>[10]</sup>），在鲁国羞于面对故人父老。大概澹台子到了江南也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只好学习乃师孔子设坛授徒，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学生虽不及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他“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影响也是很大的。

史书对于澹台的事迹，记载很少。除了他“南游至江（南）”这件事之外，再就是《史记》张守节《正义》中引《括地志》有一条关于澹台重义轻财的记载。说澹台有一次带着价值连城的宝玉渡河，船至河中时有两蛟龙欲夹击夺宝。澹台十分气愤，说：“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力劫。”<sup>[11]</sup>遂挥剑斩二蛟龙而投宝玉于河。大概这也与澹台灭明“修行”而德行深厚有关。只可惜史书中既没有关于澹台灭明如何“修行”的记载，也没有关于其在江南时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记载，使我们无法详细探讨其学术和影响。不过，由孔子以“六艺”教人、因材施教那一套和澹台本人能正确看待自我、选择适合的发展环境这一点来看，他对孔子“君子时中”的“中庸”精神是继承得很好的。

## 三

其实，从现有文献来看，孔子弟子在江南影响最大的，既不是子贡，也不是澹台灭明，而是在孔门“四科”中以“文学”著称的言偃——子游。《论语》一书中将子游和子夏一同作为“文学”一科的代表，曰：“文学：子游、子夏。”（《先进》）<sup>[12]</sup>《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说：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sup>[13]</sup>

子游可谓孔子弟子中唯一一位史有明文其为“吴人”者。当然，对此史书上也有异文。《孔子家语》即说子游不是“吴人”，而是“鲁人”。<sup>[14]</sup>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言偃，吴人”下注曰：“《家语》云鲁人。”并加按语说：“偃仕鲁为武城宰耳。今吴郡有言偃冢，盖吴郡人为是也。”<sup>[15]</sup>

其实，司马贞也只是推测之辞。笔者推测子游实是鲁国的“南武城”人<sup>[16]</sup>，或为靠近“南武城”的“吴人”，这才有了他是“吴人”还是“鲁人”的争端。因为从地理方位来看，“南武城”实是鲁国的南境边邑，吴、越至鲁的要冲之地，在春秋战国诸侯纷争、侵略战争连绵不断的时期，靠近边境之地易主的事经常出现。子游的出生之地可能原属鲁国的“南武城”，但等到他求学之日，则已属于吴国。故有的史书把他记为“吴人”，而另一些鲁国故国意识很强的人，则把他说成是“鲁人”。其实，说子游是“鲁人”还是“吴人”，这些并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子游曾游历江南，在吴地生活了较长时间，死后也葬于吴地（言偃墓位于今江苏常熟虞山东麓）。

至于子游为什么来到江南，笔者认为很可能也与澹台灭明有关。因为从上文的叙述可知，子游可谓是发现澹台灭明的伯乐，澹台能入孔门“受业”，实有赖子游的大力举荐。子游很佩服澹台的德行修为，故二人可称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史书上虽然无明文说到澹台灭明对子游的态度，但由澹台的德行修为来说，他的心里一定是对子游心存感激的。或许是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为了把孔子的礼乐文化传播出去，故邀子游南游。当然，也有可能是子游先到了江南，再邀澹台南游。不管怎样，笔者认为他们二人都来到江南这件事，应该是存在某种联系的。

子游在孔门四科中作为“文学”一科的首要代表，其思想的最大特点大概是继承了孔子以礼乐为治的政治理路。《论语·阳货》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sup>[17]</sup>

这个记载和上文所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基本相同，应该是司马迁因袭了《论语》的文字。孔子到子游任“宰”的武城视察，听到的是“弦歌之声”，那看到的是什么呢？《论语》《史记》中都没有记载。但由夫子的“莞尔而笑曰”云云和子游的对话来看，完全可以肯定孔子看到的，那一定是某种充满诗意的画面——或者说，是一幅审美的场景。所以，孔子师徒这里即使不是在直接谈论某种诗意或审美意境，而是在谈论政治问题，那也是在谈论一种审美化的、充满诗意的政治理想——用后来儒家荀子和楚国诗人屈原的概念，即是“美政”的理想。故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的解释说：孔子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是说“治小何须用大道”；而子游对答中所谓“学道”的“道”，是“谓礼乐也。乐以和人，人和则易使。”<sup>[18]</sup>即是礼乐政治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孔子与子游应该说是十分契合的。即孔子也是主张应以礼乐治国，以造成一个举国上下和谐共处、充满诗意和审美自由的社会；而子游则在武城这个地方努力地实践着孔子的这一社会政治主张，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故孔子对自己“割鸡焉用牛刀”的言论进行了明确的自我批评：“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而从传世文献来看，实际上孔子不只是在此一处表现出了与子游有相同的政治理想，别的地方亦不乏其例。如《礼记》中有《礼运》一篇，康有为、郭沫若等都认为那即是《荀子》中所谓“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虽然“那不一定是子游所记录，就在传授中著诸竹帛也一定是经过了润色附益的”，<sup>[19]</sup>但此篇却实际反映了孔子和“子游氏之儒”一系的社会政治理想乃是“大同之世”，而现实则是无奈的“小康社会”。《礼记·礼运》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sup>[20]</sup>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sup>[21]</sup>

孔子和子游的“大同世界”，千百年来一直被经学家和儒家、特别是今文经学家所乐道。但这里“其实正确的程度实在有限”：因为它只是讲了一些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而且“把原始公社太理想化了”；是“有唯心论的成分掺杂进去了的”，实“是一种人类退化观”。<sup>[22]</sup>而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同”场景，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在孔子之前的老子那里就曾见过——那就是《老子》第八十章中那段著名的富有诗意和美学情趣的描写。《老子》第八十章云：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楫，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sup>[23]</sup>

不仅如此，《老子》一书中还反复强调了达到这一理想社会的政治方法或途径，这就是要像无形、无名、无声、无为的“大道”和“上德”那样，真正做到“无为而治”。故《老子》书中多称：

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sup>[24]</sup>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sup>[25]</sup>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第三十八章)<sup>[26]</sup>

为无为，事无事。(第六十三章)<sup>[27]</sup>

相比较《老子》中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社会”而言，《礼运篇》中的“大同世界”显然多了一些关于仁爱礼义的内容，但二者的基本取向则是相同的，即都表达了一种人类对于自然本真状态的和谐社会的向往。不同的只是，在《老子》那里，这一理想社会的表现形态和达到这一理想社会的方式都是“无为”或“无为之道”，而在孔子和子游那里，则有时名之曰“道”、“德”或“无为”，有时则称之为“礼乐”。《论语·学而》曰：“君子食无求饱，……就有道而正焉。”孔安国注：“有道，有道德者。”<sup>[28]</sup>《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包咸注：“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拱)之。”<sup>[29]</sup>可见，孔子这里的“道”即是“德”，亦即是“无为”。而在上文，对《论语·阳货》中子游称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中的“道”字，孔安国已明确地说：“道，谓礼乐也。”这也就是说，老子之“道”、“德”、“无为”，实际也就是孔子及子游之“道”、“德”、“礼乐”。《老子》曾经把“道”“德”的自然状态比作“若婴儿之未孩(第二十章)”<sup>[30]</sup>，把“含德之厚，比于赤子”，<sup>[31]</sup>原因是因为“赤子”(婴儿)代表了最高的“和”的状态——“和之至”也。(第五十五章)<sup>[32]</sup>而儒家自孔子以来，所谓“礼”“乐”，也不过是“和”的代称而已。《论语》既曰：“礼之用，和为贵”(《学而》)<sup>[33]</sup>；《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记》中亦皆有“乐者，天地之和也”<sup>[34]</sup>之说。又可见，无论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还是孔子和子游所称述的“大同世界”，实际都只是一种和谐社会的理想而已。在这里，儒家的孔子和子游似乎也有了一份道家老子返朴归真、复古怀古的幽思。故前世学者或以《礼运》为“儒者受老庄之学之景(影)响而为之者也”，或“以谓孔子与老子之关系甚深，……而孔子……殆亦深知老子之学与所倡大同之义有相契合者乎？”并认为“孔子实兼道家也”<sup>[35]</sup>。而自宋儒以来，学者多以子思、孟子之心性学原出曾子，章太炎又以《庄子》中不讥颜回，而认为庄子之学当出于颜回。<sup>[36]</sup>实际上，道家思想的成分不仅在孔子那里存在，在孔子的很多弟子那里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原宪那里有，曾参的父亲曾点那里也有；颜回那里有，以“文学”著称的子游那里也有。昔康有为注《礼运》时曾说：“言偃，孔子弟子，字子游。《荀子·非十二子篇》称‘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以子游与仲尼并称，且以子思、孟子同出于子游，盖子游为传大同之道者，故独尊之。此盖孔门之秘宗。今大同之道幸得一线之传，以见孔子之真，赖有是也。”<sup>[37]</sup>其实，所谓“大同之道”并非什么“一线之传”，更非“孔门之秘宗”，它不过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审美化的和谐社会的理想，老子有，孔子及其弟子也有——而在孔子的诸弟子中，子游的这一思想比较突出一些而已。

## 四

孔子弟子“七十子”中曾游历吴地的,除子贡、子游、澹台灭明三人外,还有一个虽不在“七十子”之列,却直接承自“七十子”的江南《易》学传人——馯臂子弓。他的重要性在于由之可见儒家《易》学在江南传播的渊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sup>[38]</sup>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这一段文字,到《史记·儒林传》则变得简略了许多,只剩下了“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sup>[39]</sup>而《汉书·儒林传》虽较《史记》为详,却在人物之次第上略有不同。其言略曰: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sup>[40]</sup>

《汉书·儒林传》和《史记》的不同主要有几点:一是将桥(矫)庇(疵)子庸与臂子弓(弘)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了,由子弓(弘)传子庸变成了子庸传子弓(弘);二是将臂子弘(子弓)的籍贯由“楚人”改成了“江东人”,将子弘变成了子弓;三是将江东矫子庸改为了“鲁桥庇(疵)子庸”。

《汉书·儒林传》的这一改变可能有自己的根据,因为《史记索隐》中即有“应劭云:子弓是子夏门人”<sup>[41]</sup>的话,而《史记集解》则说“矫子庸疵”:“《儒林传》及《系本》皆作‘螭’……螭是姓;疵,名也;字子肩。然螭姓,鲁庄公族也,《礼记》‘螭固见季武子。’盖鲁人,《史》《儒林传》皆云鲁人,独此云江东人,盖亦误耳。”故钱穆以为《史记》传《易》的系统,有“可疑者六也”<sup>[42]</sup>。至于将馯臂子弘(子弓)的籍贯由“楚人”改为“江东人”,则应该是因为在臂时代,江南吴、越故地尚未被楚吞并之故。

不过,《汉书·儒林传》的这一传承系统及近人的怀疑,也遭到学者的辩驳。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说:“《史记》不用说是出于《汉书》之前,而由两者所举出的人名来看,《史记》是字上名下的古式,《汉书》是字下名上的新式……但是《史记》的臂子弘应该是经过后人的窜改。我想那原文当是‘(姓)子弘(字)臂(名)’,因为后来录书的人不知道古代的人名有新旧两种的表现方式,妄根据《汉书》把它更改了。弘字应该是‘肱’字的笔误,‘肱’与‘臂’,一字一名,义正相应。‘弓’是‘肱’的假借字。《左传》和《谷梁》的邾黑肱,《公羊》作黑弓,是同一例。”<sup>[43]</sup>因此,他不仅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的《周易》传承系统,而且还认为现在的《易传》和“汲冢所出的《周易》及《易繇阴阳卦》,都是孔子以后,即战国初年的东西”<sup>[44]</sup>;“多带有南方的色彩”<sup>[45]</sup>，“作者当是臂子弓。”<sup>[46]</sup>

根据近年在楚地先后出土的新蔡楚简易筮、包山楚简易筮、望山楚简易筮、阜阳汉简《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和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周易》等来看,早在战国前中期,包括江南在内的楚地,即已有《易》学的传播<sup>[47]</sup>。所以,笔者认为,即使文献中记载孔门《易》学的传承系统,在人名地名上可能存在个别混乱及讹误之处,但《史记》中所说的《易》学传于江南的系统是存在的,不应该因此而怀疑臂子弓其人其事的真实性。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周易》有“经”而无“传”,马王堆帛书《周易》既有“经”,也有“传”,而且其“传”无《彖》《象》《文言》《序卦》《杂卦》,而有《系辞》全部及《说卦》的前三章,以及今本所没有的《易之义》《衷》《要》《缪和》《昭力》等多种解《易》之文。这又说明,即使《易传》不能说“其作者是南人”臂子弓<sup>[48]</sup>,其中也可能有部分当为南人所作,江南至迟至“七十子”弟子那里,已有自己的《易》学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

## 五

以上是我们对孔门“七十子”游历江南及传播儒学的一个简单回顾。由此我们似也可以看到早期儒家学说的南传与江南文化间的某些联系。首先,从孔子弟子南游江南的构成来看,那些重要的南游者差不多都是“文学之士”或与“文学”有关者。子游本是孔门四科中“文学”一科的首要代表。子贡虽然列在“言语”一科,但他巧舌如簧、能言善辩。《史记》说他“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sup>[49]</sup>《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sup>[50]</sup>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sup>[51]</sup>

子贡不仅善于言辞，而且对《诗》也学习得特别好，以至于孔子许以“赐也始可以与言《诗》已矣”的赞语。要知道，在整个一部《论语》中，能得到孔子这个赞许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子贡，另一个则是与子游并列为“文学”一科代表的子夏。《论语·八佾》中当子夏问“巧笑倩兮”时，孔子也曾赞许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sup>[52]</sup>可见，子贡虽以“言语”见称，但其“文学”实亦堪称翘楚。澹台灭明，文献中未有只字言其“文学”，但《孔子家语》中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记为“以言取人，失之子羽”，笔者以为这恐怕不仅是一时的笔误，很可能是因为《家语》的作者见到另有文献说澹台其人“言语”辩丽、“文学”突出，故有“以言取人，失之子羽”一说。即以子羽“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sup>[53]</sup>这一点而言，也可以想见其“文学”的水准。至于《易》的形成，本来就是圣人观察“天文”、“地文”和“人文”的产物，传《易》之人又岂能与“文学”无关呢？

而春秋战国之际的江南文化有什么特点呢？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曾说：“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sup>[54]</sup>战国后期江南吴、越故地为楚所吞并，故学界常以楚文化为南方文化的代表。而当时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的特点，也正是“颇有文学”。这说明，在早期儒学的传播时，选择哪些人在什么地方传播、并能取得成功，都是具有深刻历史缘由的。江南“文学”发达的地域文化特点，似更适合更具“文学”性的儒士、以带有“文学”性的方式来传播儒学；而反过来，江南地区也可能更需要和更欢迎这种带有“文学”性的儒学。江南是一块适合“文学”性儒学播种和生长的土壤，而此后江南的学术文化亦似带有更多的“文学”特征。

其次，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的关系来看，江南本是道家思想生长的天然沃土。《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sup>[55]</sup>（《汉书·地理志》与之略同）故江淮以南适宜高谈玄虚之道家的产生，观《国语》之《吴语》《越语》中范蠡、孙武与《老子》书相似之语，即可知江南早已有道家思想的种子。故早期传播到江南的儒学思想，更带有明显的道家思想的特征，就是很自然的了。

再次，由孔门“七十子”携儒学南传江南的路线来看，我们发现以往仅以北方学术经由楚国南传的观点，是并不完全和并不准确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因为“太王欲以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sup>[56]</sup>从此，人们几乎形成了北方文化乃经由楚国传到南方的思维定式。由孔子弟子皆由齐、鲁至而吴、越之地传播儒学的事实来看，北方学术文化的南传，除了楚国这一途径之外，还有东部齐、鲁一线，至少在孔子弟子“七十子”所在的战国时代是如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乃是儒学传入江南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由此也可见，中国南北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多途径和多渠道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在时空上传之久远、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 注释：

[1][2][3][4][6][7][8][10][11][13][15][38][39][41][49][53][55][56]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85页，第2195页，第2197页，第2197页，第2198页，第2200页，第2205-2206页，第2206页，第2205页，第2201-2202页，第2201页，第2211页，第3127页，第2211页，第2195页，第2206页，第3270页，第1445页。

[5][9][12][17][18][28][29][33][50][51][52]程树德：《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42页，第391页，第742页，第1188-1189页，第1189页，第53页，第64页，第46页，第54页，第56页，第159页。

---

[124]王肃：《孔子家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16]根据钱穆的考证，鲁国实只有一个武城，所谓“南武城”、“北武城”实皆是此武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7-128页。

[19][22]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3页，第103页。

[20][21][34]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6页，第658-659页，第1090页。

[23][24][25][26][27][30][31][32]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2-233页，第67页，第139页，第142页，第197页，第102页，第178页，第179页。

[35]《原儒上》引张孟劬语。见陈柱：《诸子概论(外一种)》，毕明良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0页。

[36]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37]康有为：《礼运注》，转引自陈柱：《诸子概论(外一种)》，毕明良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0页。

[40]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7页。

[4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7-98页。

[43][44][45][4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1-392页，第389页，第390页，第392页。

[47]此据陈仁仁：《论〈周易〉文本早期形态的一些问题——从楚地易类文献来分析》，见丁四新：《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16-345页。

[48]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帛书《周易》属于在楚地“别传”的一个“《周易》系统”，“楚地是有正宗的《易》学流传的”，这就是“久居楚地的荀子”所传之《易》学。(参见李学勤：《论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3-258页。)但也有学者认为“帛书”《周易》说明“《系辞传》原为楚地的经师传授的著作”，“融合有道家黄老学派的学说”。(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3页。)

[54]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71页。